

戴望舒与施绛年的情感往事

中国现代派诗人、翻译家戴望舒是继徐志摩之后中国新诗的杰出代表。戴望舒和著名文学家施蛰存是一生的知己和好友，他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时，曾与施蛰存、杜衡等人成立兰社，创办文学刊物《兰友》。在戴望舒的情感道路上，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相识

施蛰存有四个妹妹，分别是大妹施绛年、二妹施咏沂、三妹施灿衢和四妹施企襄。

施绛年生于1909年1月22日，小施蛰存和戴望舒4岁。施绛年曾就读于松江景贤女子中学。

1927-1928年间，戴望舒经常往返于松江施蛰存家和上海之间。尤其是1928年上半年，戴望舒、杜衡和冯雪峰在施蛰存家里从事文学活动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戴望舒有了与施绛年认识的机会。

据多种传记资料记载，戴望舒追求施绛年，而施绛年不为所动。这种惆怅和忧伤，促使戴望舒写下了《雨巷》《我底记忆》《烦恼》等诗歌，这些充满古典气息和伤感情绪的诗句，袒露了戴望舒对施绛年的一片深情。1929年，戴望舒第一部诗集《我底记忆》由水沫书店初版，扉页内容为“A Jeann”，据作家徐霞村回忆：“用法语写的A Jeann，意为‘致绛年’。Jeann是法国女孩子的名字，音正好与‘绛年’差不多；A是‘致’的意思，献给她的。”

在这一期间，水沫社编译的《法兰西短篇杰作集》于1928年10月1日出版，该书收有施蛰存、戴望舒等翻译

的小说7篇；1929年5月，水沫社编译的《俄罗斯短篇杰作集》第一册出版，该书也收录施蛰存、戴望舒等人翻译的小说7篇。这两本书里有署名施绛年的翻译小说，分别为法国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《砲台之袭取》，和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《红花》。

这两篇翻译小说是否为施绛年本人所译，还需要考证。1928年《法兰西短篇杰作集》出版时，她才19岁，以她的学历背景，选择梅里美和迦尔洵为翻译对象，是有一定难度的。那这两篇翻译小说的真正翻译者会是谁呢？

《法兰西短篇杰作集》和《俄罗斯短篇杰作集》这两本书是施蛰存、戴望舒和冯雪峰等人在文学工场时期宏伟计划的一部分，此时戴望舒正在追求施绛年，用追求对象的名字来署名，有一定的可能性。而且，迦尔洵和梅里美都是这一阶段戴望舒关注和翻译的对象。

为了爱情赴法留学

几年后，戴望舒追求施绛年终于出现转机。

1931年10月1日出版的《新时代》发表《戴望舒与施蛰存之妹订婚》，称戴望舒倾爱施绛年已非日，数月前曾一手拿安眠药水，一手拿求婚戒指向绛年女士求婚。

看到戴望舒如此固执，施绛年害怕了，也心软了，加上家人的劝说，遂于1931年与戴望舒订婚，并公开举行了订婚仪式。不过施绛年向戴望舒提出了结婚的条件：必须要去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，回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方能嫁给他。

1932年10月8日，为了一份爱

情，戴望舒踏上邮轮赴法留学。

戴望舒是个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，不喜欢学校刻板的教育方式。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，他并没有认真听课，甚至从不参加考试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阅读、游历、翻译、交友和冥想上。那段时间，戴望舒陷入了手头拮据的状态，只能靠施蛰存每月寄来的80元勉强维持。在寄钱的同时，施蛰存不忘叮嘱老友好好读书之余，多创作一些作品，尤其是诗歌，因为国内读者都希望读到大诗人的新作。只是，戴望舒并没有如施蛰存所愿，三年时间里，他只是寄了几篇翻译作品回国，新创作的作品只有5首。

戴望舒常给施蛰存与施绛年写信，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，从施蛰存的数通回信中，可窥见戴望舒与施绛年之间的情感纠葛。

1933年2月17日，施蛰存致信戴望舒：“你还要绛年来法，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，因为无论如何，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，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。况且她一来，你决不能多写东西，这里也是一个危机。”可见戴望舒日思夜念施绛年，一度想让她赴法，恋人团聚。只可惜未能如愿。

1933年5月29日，施蛰存致信戴望舒，末了说：“这封信太长了，搁笔于此，绛年一同致意。”由此可看出，此时的施绛年已不大有热情和兴致给戴望舒写信了。

1934年的春季，巴黎爆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。戴望舒不仅参加了这次游行，还跑到西班牙参加了马德里的抗议活动，被西班牙当局遣返回法国。里昂中法大学因戴望舒没拿到一个学分，按校规将其开除。

戴望舒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——可就算戴望舒带回来再多的文凭，对他的爱情也无济于事。

两次婚姻以悲剧收场

施绛年爱的不是戴望舒，其心早有所属。施蛰存说：“大妹绛年与

一位常熟人名叫周知礼结婚了。绛年当时在邮政局工作，我的这位大妹夫在上海的北极冰箱公司做推销员，他的家庭关系全都在台湾，因此在1949年初，他们全家去了台湾。在台湾时，他们夫妇二人都在欧亚航空公司供职，生活得很好。与我经常通信。绛年于1960年10月病逝在台湾。”

周知礼毕业于复旦大学，与施绛年曾同在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。据1936年的《复旦同学会刊》的消息描述，“常熟周知礼，美风姿，年少翩翩，复旦之子都也。姻交际，善词令，所交遍歌浦，与之游者，无不悦服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面对风度翩翩、擅长社交且工作能力又强的周知礼，即便是有兄长施蛰存为戴望舒说项，施绛年的感情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周知礼。

戴望舒失恋后心情沮丧，整天进舞场、逛马路，全然没有了当初的豪情壮志。好友穆时英见戴望舒这样，便将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。由于爱好文学，她对戴望舒这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十分仰慕，两人相爱，并于1936年6月初结婚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戴望舒一家迁到香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穆丽娟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裂痕却越来越大。戴望舒性格内向，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除了应酬外，平时话语不多。穆丽娟抱怨说：“望舒的第一生命是书，妻子女儿则放在第二位。”几经争执后，两人于1943年1月协议离婚。

几个月后，戴望舒便由朋友介绍，认识了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经理部的女职员杨静。两人很快结婚。当时新郎38岁，新娘才17岁。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，杨静分别生下了两个女儿，可属于戴望舒的幸福依然短暂，仅仅维持了6年。丈夫好静，妻子好动，性格差异太大。有一段时间，戴望舒工作难找，经济拮据。恰好此时，隔壁的一个小青年不时向杨静献殷勤，杨静竟然跟这个青年私奔了。这个打击让戴望舒无法承受，两人最终离婚，各带一个女儿。戴望舒的三段感情、两次婚姻都以悲剧收场，让人扼腕叹息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茅盾希望后辈“长大学科学”

1957年，沈韦宁出生在南京，爷爷茅盾给他起名学衡，意为学习张衡（东汉时期著名天文学家），因生在南京，故乳名“小宁”（南京简称“宁”）。“1958年，爸爸从南京军事学院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（现国防大学）工作。每逢周末，爸爸便带着我和姐姐到文化部宿舍大院看望爷爷奶奶。”沈韦宁回忆说。

茅盾喜欢孩子，可是又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因此看戏或度假时如有可能就带上孩子们。他很喜欢和孩子们聊天，孩子们往往会提出各种问题，他也总是耐心地给以解答。沈韦宁说：“有一次，爷爷带着我去看戏，碰见蓄着长须的沈钧儒老先生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问爷爷，‘大胡子爷爷睡觉的时候，胡子放在被子里面，还是被子外面呢？’爷爷笑着说，‘小宁你这个问题把爷爷给难倒了！’”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茅盾赋闲在家。那时，他常无奈地说：“现在倒有时间和孩子们玩玩了。”

沈韦宁动情地说：“爷爷年轻时，就想科学兴国，他自己没能做到，就希望儿孙们能完成他的心愿。1969年7月11日，我妹妹出生了，这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很大的快乐。我爸爸请爷爷给我妹妹起名字，爷爷却说，‘我给小钢（我姐姐）、小宁起名迈衡、学衡，是希望他们长大学科学，搞点实际的事业，不曾想到现在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更不用说学科学了！小毛毛（我妹妹）的名字，你们就自己起吧！我的父亲崇尚新学，自学声光电，想为富国强民效力，却不幸早逝，留下遗言要我和弟弟泽民学科学。我从小不通数理，弄上文学辜负了父亲的遗愿；泽民的数理化一直是班上最突出的，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高才生，后来他参加了革命，牺牲了。阿桑（我爸爸）小时候数学很好，我原打算让他学理工科，可是抗战爆发了，他去了延安。’后来，我爸爸给我妹妹起名丹燕，意思是，爷爷是大雁，她是小燕，长大学爷爷。”

据《中国档案报》屈建军/文